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教育的重构与创新^①

——冯庆华教授访谈录

徐铤伟 冯庆华



【摘要】 本访谈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翻译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聚焦3个议题:翻译教学的“比较—分析—归纳”方法创新;语料库与人工智能在翻译研究,特别是母语与非母语译者思维模式研究中的应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教育的重新定位。冯庆华教授认为,技术驱动下的翻译教育需要重构教学内容与评估标准。他提出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范式和“通百艺而专一长”人才培养模式,为翻译教育提供了全新视角。在新形势下的翻译教育改革中,应积极拥抱技术变革,重新定位教育价值,培养超越人工智能的能力,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

【关键词】 翻译教育;人工智能;语料库;思维模式;教学创新

访谈者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行业与高校翻译学科正经历深刻变革。机器翻译、大语言模型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翻译实践的方式,还对翻译教学与研究及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最新技术的引入为翻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对译者能力、学术研究及教育方法的创新提出更大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从事翻译工作近40年,以丰富的教学实践和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位标志性人物。冯教授为各层次学生开设涵盖翻译理论与实践、文体翻译、经典文学翻译与语料库研究等课程。他主讲的“翻译有道”入选“上海市精品课”、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级一流

① 本文系202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交叉学科和冷门绝学课题“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精准国际传播与翻译中的情感叙事研究”(课题编号:25JCXK004YB)的阶段性成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研究基地2024年度委托课题“大语言模型在翻译实践教学中的创新路径与效果研究”(课题编号:2024WGYYWH04)的阶段性成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24年度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AIGC时代下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编号:2405160003)的阶段性成果。

本科课程”。他长期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的创新与翻译研究的探索,通过实践推动了翻译教育的现代化与数字化转型。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机协作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以适应行业快速变化,而语料库技术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不仅改变了翻译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也为翻译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方向。冯教授的学术成果,如《实用翻译教程》《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等,已成为翻译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他还主编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三五”重点电子出版物“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并受教育部委托主编《普通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为翻译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本专访旨在深入了解冯庆华教授在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经验及其对未来翻译教育的思考,探讨如何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实现翻译学科的创新。以冯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型译者”与“教育型研究者”的宝贵经验和深入思考,有助于为当前翻译学科的数字化转型和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与启示。

1. 许渊冲老师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徐铤伟:冯老师,作为翻译领域的资深专家,许多学生都对您的翻译之路十分好奇。您是如何与翻译结缘的?另外,您曾在课堂上提到的“卡片记录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学习方法?

冯庆华: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分享。我与翻译的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大二时,我对《红楼梦》英译本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之前,我已经认真阅读过原著,当时偶然接触到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让我感到非常新奇,也激发了我对翻译工作的热情。

关于你提到的“卡片记录法”,这确实是我多年来坚持使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具体来说,每当我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精妙的词句或表达方式,就会将它们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卡片上。这些卡片便于我随时取出复习和思考,帮助我不断积累语言素材。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实际上让我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深入体会翻译的艺术精髓。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点滴努力,开启并巩固了我与翻译的不解之缘。

徐铤伟:您刚才提到的“卡片记录法”确实很实用。我记得您还曾提到过“漫步听书法”,这种方法对您的学习和翻译工作有什么特别帮助呢?

冯庆华:“漫步听书法”是我多年来坚持的另一种学习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会一边散步,一边听录音资料,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吸收了知识。在这种放松状态下,大脑往往能够更加活跃,产生一些新的灵感和想法。这对我的翻译实践和研究都有很大帮助。身体活动和思维运转的双重作用,常常能让我在翻译难题上有所突破。

徐铤伟:这种身心结合的学习方法确实值得借鉴。说到翻译实践,我很好奇,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您是如何赚到翻译的“第一桶金”的?能否与我们分享这段经历?那次成功是否为您后续的翻译实践和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冯庆华:谈到翻译实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自己第一次获得稿费的经历,这确实可以称作我“翻译路上的第一桶金”。当时在老师的推荐下,我接到了北京某个渠道介绍来的项目,需要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一项学术性很强且篇幅较长的汉译英工作。对于刚刚起步的翻译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但也正是这种挑战让我得以迅速成长。当时的稿费是799元,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忆犹新。要知道,那时我的月收入只有七八十块,而这笔稿费足足相当于我10个月的工资收入!收到这笔稿费时,我感到非常开心,但这种喜悦并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一笔可观收入,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通过这份翻译工作为社会贡献了近800元的价值。这种为社会服务的成就感,远比金钱本身更让我感到满足和骄傲。这次经历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参与翻译实践,翻译了大量汉译英项目,为社会提供服务,比如企业介绍等材料,其中90%以上的内容都是汉译英方向。

与出版相关的翻译工作是在我来到上海之后逐步展开的。当时,我通过许渊冲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钧陶老师。在吴老师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参与了许多出版作品的翻译工作,包括英译汉和汉译英。从最初参与翻译,到后来成为主译,甚至担任翻译主编,我在这一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在那“第一桶金”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徐铤伟:听您讲述了“第一桶金”的经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您的职业发展轨迹。在翻译学习过程中,想必也有一些关键人物给予了您重要指导。能否与我们分享,有哪些人对您的翻译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庆华:谈到对我影响深远的人,许渊冲老师无疑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我与许老师的缘分始于大四的翻译课堂。当时他担任我们的翻译课教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老师的语言表达极其精湛,讲课内容生动有趣,让每一堂课都充满了启发性。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总是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用大量来自他个人翻译实践的例子来阐释翻译原理。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让课程内容更加鲜活,也使我们能够直观地理解翻译工作的实际操作。这样的教学风格,极大提升了我对翻译的兴趣,也让我对许老师本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促使我在准备考研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翻译方向,并将导师目标确定为许老师。非常幸运的是,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许老师也真的成了我的导师。不过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这一批学生由学校委托复旦大学来培养,所以我们是在复旦学习的。而许老师因为回到了北京大学工作,主要通过远程方式来指导我。尽管存在地理上的阻隔,许老师仍以极其负责的态度细致指导了我的学习与研究。特别是在论文修改与完善过程中,他总是给予我耐心指导和建议。这种远

程指导的模式让我深刻体会到导师的责任感和教学热忱。许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限于学术层面,更在于他以身作则,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致力于在语言与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他的翻译作品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让我深刻理解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创造性传递。这种理念和精神,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我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

总的来说,许渊冲老师在我翻译学习的过程中,既是学术引路人,也是翻译实践的榜样。他不仅带领我进入翻译学术殿堂,还通过他的教学方式和人格魅力,让我更加坚定对翻译事业的热爱与追求。他是我学习道路上的灯塔,也是我职业发展的重要指引者,这种影响将伴随我整个翻译生涯。

徐铤伟:听您讲述许渊冲老师对您的深远影响,让我们看到了良师益友在翻译道路上的重要性。对了,我想借此机会,祝贺您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翻译家,您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者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质和能力呢?

冯庆华:谢谢你!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者需要多方面素质的综合。首先,扎实的语言基础是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这包括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深入理解和精准把握。但仅有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翻译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文化洞察力。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桥梁。一个优秀的翻译者应当能够感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细微差异,理解词语背后的文化内涵,并找到恰当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表达出来。第三,丰富的知识储备也是不可或缺的。翻译工作涉及各个领域,无论是文学、科技、法律还是商业,都需要翻译者具备相应专业知识,了解相关背景。正如我常对学生说的那样,“博览群书,触类旁通”对翻译者而言尤为重要。此外,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持续学习的精神同样重要。翻译工作经常需要我们分析复杂的句式结构,厘清作者的思路脉络,这就要求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而语言和知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持续学习的精神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专业敏感度。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翻译:翻译就好像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必须保持优雅的舞姿。这形象地说明了翻译工作的特性——我们需要在严格的语言规则限制下寻找灵活的表达方式,在文化和情感的约束中展现创造力和细腻感。这种创新能力和灵活应对各种翻译难题的能力,是区分普通翻译者和优秀翻译者的关键所在。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优秀的翻译往往诞生于对细节的反复推敲和与打磨之中,能够在看似平常的词句中发现潜在问题并巧妙解决。这种对细节的专注和执着,是每一位追求卓越的翻译者都应具备的品质。

2. 从卡片到 PPT:教学本质始终是有效传递知识并启发学生思维

徐铤伟:您的许多同学都选择了收入更高的职业路径,比如外资企业或政府外事部门,而您却坚定地留在了教学岗位。这种坚持是否源于您对教学的热爱?另外,我注意到您常提及自己的个人图书馆,它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是否承载了特殊的学术意义与精神寄托?

冯庆华:你的观察非常敏锐。我坚持选择教学岗位确实与对教学的热爱密不可分。个人图书馆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和政府外事部门能提供远高于教育行业的收入和福利。尽管内心有过权衡,我最终选择留在教学岗位。这有几个深层次原因:第一,教学工作带给我无与伦比的精神满足。见证学生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这份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第二,我的个人图书馆在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多年来我收藏了涵盖文学、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多领域的大量书籍,并制作了详细的检索卡片系统。这些不仅是我教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更是与学术世界联系的桥梁。若离开教学岗位,这些珍贵资源可能被闲置,而我也会远离最令我着迷的学术世界。

我始终认为,教学不仅是职业,更是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通过教学,能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看到学生从我的课堂和书籍中汲取养分,在各自领域绽放光彩,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是我最珍视的财富。

徐铤伟:您的教学生涯经历了从卡片到 PPT 的转变,您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之间找到平衡,并在技术赋能背景下保留传统教学的价值?

冯庆华: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卡片使用贯穿了多个重要阶段,同时技术发展也不断改变我的教学方式。

我的卡片使用始于本科时期,最初为整理翻译案例,制作了 500—600 张卡片。到研究生阶段,卡片量增至 3000—4000 张,每张均手写记录具体翻译例子并分类归档,这构建了我翻译研究的知识基础。进入教学岗位后,我将卡片方法应用于教学,每次备课准备 40—50 张专题卡片带到课堂,学生亲切地称我为“卡片先生”。卡片教学的核心优势在于灵活性和条理性,能随时调整内容,结合板书形成清晰的逻辑结构。

随着多媒体普及,我经历了从卡片到 PPT 的过渡。PPT 在组织内容和视觉呈现方面有独特优势,但我也认识到传统板书的不可替代价值——它是一种思维展示过程,能培养学生专注力和记笔记的习惯。

我认为在技术赋能背景下保留传统教学价值,关键在于正确定位技术——它应是辅助工具而非主导因素。最有效的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利用数字工具

呈现丰富内容,同时保留板书的思维引导和互动环节。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学本质始终是有有效传递知识并启发学生思维,这是我们在数字化浪潮中应当坚守的教育初心。

3. 在翻译教学、实践和研究 3 个维度上全面发展

徐铤伟:从卡片到 PPT 的转变切实体现了传统方法与教育技术的融合。接下来,我想将话题转向您的学术研究领域。您不仅通过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还巧妙地将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翻译期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在翻译教学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进入研究领域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哪些关键契机或思考?

冯庆华:这确实是一个让我感慨万千的话题。从教学和实践逐步进入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渡,更是一个让我不断成长和深化认知的过程。回顾我的职业发展轨迹,最初的翻译工作更多地侧重于实践层面,比如完成各类汉译英项目或参与出版物翻译等。这些工作虽然充实且有价值,但主要是应用性质,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梳理。随着教学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在为学生讲解翻译原理和方法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修辞技巧、语义转换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都值得通过学术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学生提出的疑问,常常启发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问题意识和实践基础。在这个从实践到研究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关键契机值得特别提及,那就是与《英语学习》期刊的合作。当时的主编主动联系我,希望我能为他们的“翻译之窗”栏目投稿。《英语学习》是一本月刊,每期都设有这个专栏。这个邀请对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且在深入思考后,没有选择零散地写几篇文章,而是提出了系统化、系列化的研究计划。

我的第一个系列以“成语与翻译”为主题,精心设计了 8 个专题,包括英语成语汉译、汉语成语英译、翻译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翻译中英语成语的使用、谚语的翻译、惯用语翻译、歇后语的翻译以及俚语翻译。这一系列文章得到了读者广泛好评,也让我尝到了将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转化为研究议题的甜头。我发现,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翻译理论,还能为教学 and 实际翻译工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我在研究和应用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一系列成功发表后不久,《英语自学》期刊的主编又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我撰写另一个系列。这次我选择了“修辞格与翻译”作为主题,将各类修辞格分为 10 组,每组探讨一类相近的修辞格及其在翻译中的处理方法和原则。这个系列同样受到读者欢迎。通过这些系列文章的构思和发表,我逐渐形成了将翻译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

独特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从具体的翻译问题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和社会实践的实际指导价值。这种“实践—研究—再实践”的良性循环,让我的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这一经历也让我明白,优秀的翻译研究不应该是纯粹的理论建构,而应该植根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高质量的翻译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反思,才能不断提升和完善。正是这种认识,让我更加坚定了在翻译研究领域继续探索的信心和决心,并为后续更深入的学术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从教学和翻译实践到翻译研究的转变,不仅是机遇的把握,更是兴趣推动和责任驱动的结果。现在回头看,这段经历让我真正领略到翻译研究的魅力和意义,也使我能够在教学、实践和研究3个维度上更加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翻译事业。

4. 翻译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良性循环

徐铤伟:您从翻译实践到研究的转变历程,以及“实践—研究—再实践”的循环模式,确实令人大受启发。您刚才提到,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期刊系列文章为后续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基础。而您编写的《实用翻译教程》不仅填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教材的空白,还历经4次修订,成为备受欢迎的教材之一。您是如何开始编写翻译教材的?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您是如何构思框架的?又是如何将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巧妙结合起来的?此外,这本教材的编写是否为您在翻译研究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冯庆华:教材编写确实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教学实践的重要载体。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像《英语学习》《英语自学》这样的期刊平台是非常宝贵的职业起步资源。它们不仅能够在职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也能为更广泛的学术和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平台。我自己的教材编写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教材编写的契机来得有些出乎意料。1995年,当时的系主任邱懋如老师找到了我。他说:“翻译教研室应该编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翻译教材。长期以来,‘上外’使用的都是其他学校编写的教材,作为国内外语教育的重要基地,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教材体系。”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要求将汉译英和英译汉2个方向都包含在内。我思考了一阵子,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在构思教材框架时,我首先回顾了自己之前的研究成果,发现可以将期刊上发表的2组系列文章——“成语与翻译”和“修辞格与翻译”——有机地纳入教材体系。虽然以前的翻译教材中也有类似内容,但大多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而我的这2组系列文章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为学生提供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学习内容。因此,在我编写《实用翻译教程》时,成语与翻译的8个

专题,以及修辞格与翻译的 10 个专题都被完整编入其中。除此之外,我还加入了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积累的多译本比较研究成果,以及一些传统的翻译实践内容。在结构设计上,我特别注重学习路径的合理性:学生先进行翻译实践打基础,再过渡到欣赏分析多译本文本,最后进入理论探讨。这一安排符合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1996 年底,我将《实用翻译教程》文稿交给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很快就获得录用并于 1997 年首次出版,截至目前,该教材已经历了 4 次修订,足见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最近一次修订始于去年,相比前三版,第四版有了一些重要改进,尤其是在研究内容和教学工具的结合方面。例如,我在教材下册中增加了大量与语料库研究相关的内容,包括翻译语料库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步骤等。这些内容更加贴近当代翻译研究的前沿动态,也为教学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可以说,教材修订过程本身也推动了我在翻译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新方向,尤其是在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新兴领域。此外,第四版教材还新增了一个专门的在线平台。由于教材修订通常需要间隔 5 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线平台能够实现对新材料的实时更新。例如,汉译英或英译汉的新案例,以及语料库的新工具,都可以通过平台每年更新 1—2 次。这种灵活的更新方式非常适合当下师生需求,也体现了我对数字化教学转型的积极响应。在教材的印刷和呈现方面,也做了很多改进。第四版采用了学生更喜欢的大开本,并使用双色印刷(蓝色和黑色),使内容更加醒目和易于阅读。同时,我还将所有的 PPT 课件也交给了出版社,方便教师和学生通过平台直接下载使用。平台采用专用账号体系,使用教材的单位和个人都能方便获取相关资源。

回顾我的教材编写历程,我深感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的重要性。一方面,研究成果为教材提供了坚实学术支撑;另一方面,教材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推动了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种良性循环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生涯,也为翻译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5. 母语译者与非母语译者的优势互补与共享

徐铤伟:您的翻译教材不仅体现了您的学术积累,也为全国翻译教育做出重要贡献。您在翻译研究中提到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并针对其背后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您认为,可以通过语料库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更好地提取思维模式并优化翻译实践。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具体实现这两类译者的优势互补?此外,在语料库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下,如何能更有效地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教学中?

冯庆华:这个问题触及了我近年来研究的核心领域。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重点逐渐聚焦于母语译者与非母语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分析,以及对

其背后思维模式的探索。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一研究中,我始终坚持不评判孰优孰劣的原则,而是客观地探索 2 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各自风格特点和独特优势。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我发现母语译者的译文通常在可读性(readability)方面表现优异,他们的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读起来流畅自然;而非母语译者则在对原文的理解和忠实度上更具优势,他们对源语文化或文学作品的推广也往往更有贡献。这种差异引发了我对母语思维模式和翻译思维模式的深入思考。我意识到非母语译者虽然具备对原文的深刻理解能力,但在目标语言的表达上确实存在一定局限。这种局限部分源于传统外语教学的弊端,尤其是语法教学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中有许多隐蔽的表达特征和思维模式是现有语法教材无法涵盖的。

关于如何实现 2 类译者优势的共享,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建立协作翻译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构建由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组成的翻译团队,让非母语译者负责初译,确保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忠实传达;然后由母语译者进行润色和修改,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表达自然度。这种协作模式在文学翻译和重要文献翻译中尤为有效。第二,开发针对性的翻译训练方法。对于非母语译者,应加强目标语言的地道表达训练,特别是那些与母语思维模式差异较大的表达方式;对于母语译者,则应加强源语言文化背景和深层含义的理解训练。这种差异化训练可以帮助 2 类译者互相借鉴对方优势。第三,利用语料库技术提取思维模式。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构建平行语料库,系统提取和分析母语译者与非母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差异。

过去七八年间,我投入了较多时间研究翻译中的思维模式问题,不仅将研究成果撰写成专著,也积极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在教学实践中,我大量引入思维模式的研究内容,引导硕士生和博士生从这一角度撰写论文。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帮助学生们开阔了研究视野,也为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了更多实证支持。

关于如何将语料库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到翻译教学中,我有以下几点思考:一、将语料库融入课程设计,让学生通过分析真实语料发现母语与非母语表达的差异。二、开发智能辅助工具,帮助非母语译者改进不符合目标语言习惯的表达,同时为母语译者提供文化理解支持。三、构建混合教学模式,将传统理论与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结合,培养学生的对比意识和批判思维。

在技术应用方面,我认为教师至少应掌握基本技术能力,否则很容易在教学手段上落后于学生,甚至在研究思路受到限制。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提升教学现代化水平,还能为研究打开更多视角。例如,语料库可以支持定量分析,将传统定性分析难以处理的问题数据化;而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则可以让研究既有坚实骨架,又充满血肉。

6. 技术是助手而非替代者

徐铤伟: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外语教育正面临重大变革,亟须重新定义教学内容、评估机制以及教师角色定位。请教冯老师,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呢?外语教育又该如何在未来社会中找到其定位?

冯庆华:这是个及时且重要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给语言类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想从3个方面谈谈思考。一、关于人工智能对外语教学的影响,社会上存在一些误解,认为随着翻译软件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学习外语的必要性已大大降低。我认为这忽视了外语教学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要贡献。外语不仅是国际化的“拐杖”,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今天,我们仍需通过外语教学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二、关于应对策略,人工智能虽强大但非万能。我们需要系统研究其能力边界,将它无法胜任的领域作为教学改革重点。例如,将文化深度解读、语义敏感性培养和语言规则高级运用纳入课程内容。未来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技能,还需熟练使用人工智能平台,展现超越机器的独特能力。高校需要从课程设计入手进行系统调整,如引入语言与技术的交叉领域,注重跨学科能力培养。三、关于外语教育的未来定位,单纯语言技能已不足以支撑专业发展。我们培养的学生需要在文化传播、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展现独特优势。“通百艺而专一长”的培养模式更适应未来社会需求。外语教育还应注重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承担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

总之,人工智能发展为外语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我们需要培养既掌握语言技能又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确保外语教育在未来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铤伟:您提出的“通百艺而专一长”和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实现突破的理念,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外语教育的价值和定位极具启发性。最后,请您寄语广大翻译学习者和爱好者。

冯庆华:翻译是一座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作为翻译学习者和爱好者,你们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也充满意义的道路,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翻译是我们学习外语的起点,也是一种归宿。在学习初期,我们通过翻译理解语言的深层结构;而当语言学习转化为实践时,翻译又成为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连接理论与实践。保持对翻译的热情与专注吧!这项工作需要长期积累,既需要语言能力,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在翻译道路上,你们会为词语选择而纠结,为句子结构而苦恼,为文化隐喻而绞尽脑汁。但正是这些困难让你们深入思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每次翻译挑战都是思维锻炼,每次跨语言转换都是

文化对话。

积极拥抱新技术吧！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翻译行业。学会与技术共舞，同时保持批判性思维。记住，技术是助手而非替代者，真正的翻译智慧仍需依赖人类的文化理解和创造性思维。

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责任。你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每次翻译都在为文化理解与融合贡献力量。愿你们在翻译道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用努力和智慧推动翻译事业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书写崭新篇章！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eng Qinghua

XU Yaowei FENG Qinghua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cusing on three core topics: innovation in the “comparison-analysis-inductio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the application of corpora and AI technologie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particularly in studies of the cognitive patterns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translators;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I. Professor Feng Qinghua argues that technology-driven translation education necessitates the restructuring of curricular content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His advocacy of a paradigm that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 “versatile yet specialize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discipline. In the ongoing reform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it is vital to embrac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define educational values, foster abilities that transce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ivate versatile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Keywords: translation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corpora; cognitive models; pedagogical innovation

作者简介:

徐铤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语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智人文、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技术研究。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研究。